

文明的脊梁：讀《百工重器》有感

吳志良

歐洲天氣炎熱，中國空調供不應求，一時成為熱門話題，與「小院高牆」形成強烈反差。

在中國，我們從無到有，正身處一個器物空前繁盛的時代。指尖劃過屏幕，高鐵穿越山川，每一度電的脈衝支撐着文明的運轉。然而，一個近乎殘酷的追問常常被淹沒在喧囂的日常裏：這些支撐現代生活的重器，是誰造的？我們享用一切，卻鮮少知道器物背後沉默的名字。再進一步，中國為何能夠建成工業體系最完善、製造能力最強的國家，向世界供應各式各樣的产品？

近讀龍門食客的網絡長篇小說《百工重器》，掩卷沉思，心緒久久難平。這不僅是一部關於中國工業崛起的長篇敘事，更是一部叩問中華民族何以在短短百年間重塑脊梁的文明啟示錄。書中虛構的「國工閣」是一個充滿哲思的審判台：任何工業巨匠踏入此間，畢生心血瞬間歸零，他們必須褪去一切光環，直面一個終極追問——「你為何而造？」

這一問，問出了工業文明背後的價值底色。自洋務運動開啟近代化探索，到新中國在一窮二白中奠基工業體系，再到今日面對技術封鎖的突圍攻堅，中國工業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信念與價值的抉擇。為何要在最困難的時候造原子彈？為何要花數十年造大飛機？為何在被封鎖後更要堅持造芯片？這些都不能用「需要」二字輕巧作答。

於是，那些蕩氣回腸的辯護穿越時空而來。《百工重器》書中寫道，「中國汽車之父」饒斌握着造第一輛解放牌汽車的扳手說：「造汽車，就是造希望。」「鐵人」王進喜披着那件舊棉襖說：「有了油，國家就有血了。」「兩彈元勳」鄧稼先捧着那疊手寫數據紙說：「原子彈爆炸那天，我哭了，不是因為高興，是因為我們終於不用怕了。」

這便是中國工業最根本的文化基因——將個人的技藝同民族的命運熔鑄在一起。自古及今，中華文明中的家國情懷從來不是一種抽象的道德說教，而是融入血脈的實踐哲學。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到班超投筆從戎萬里封侯，再到「兩彈一星」元勳甘願隱身大漠數十載，這條精神脈絡從未中斷。

《百工重器》以四幕史詩般的結構，勾勒了中國工業從「造不了」到「造得世界第一」的百年征程。從第一幕「奠基」中拓荒者的從無到有，到第二幕「突圍」中通信人與芯片人在封鎖中的一步步前拱，再到第三幕「登頂」中高鐵與新能源的領跑全球，直至第四幕「傳承」中接棒的第四代工業人——貫穿始終的不只是技術迭代，更有一股「傳薪」的精神力量。

書中那些具穿透力的段落，來自跨越時空的相遇。當率先算出圓周率的祖沖之的投影量量子科學家潘建偉：「你的機器，比我算得快？」潘

建偉答：「快一億億倍。」祖沖之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那你替我，多算一點。」當歷史上「世界航天第一人」、以身試險的萬戶的投影摸到月壤，他說：「五百年前，我綁了四十七支火箭，想飛上去。現在，你們上去了。」這些對話，讓人潸然淚下。從祖沖之到潘建偉，從萬戶到嫦娥團隊，那顆「想造」的心，一點都沒有變。這便是文化的力量，是流淌在民族血脈中生生不息的創造力與求知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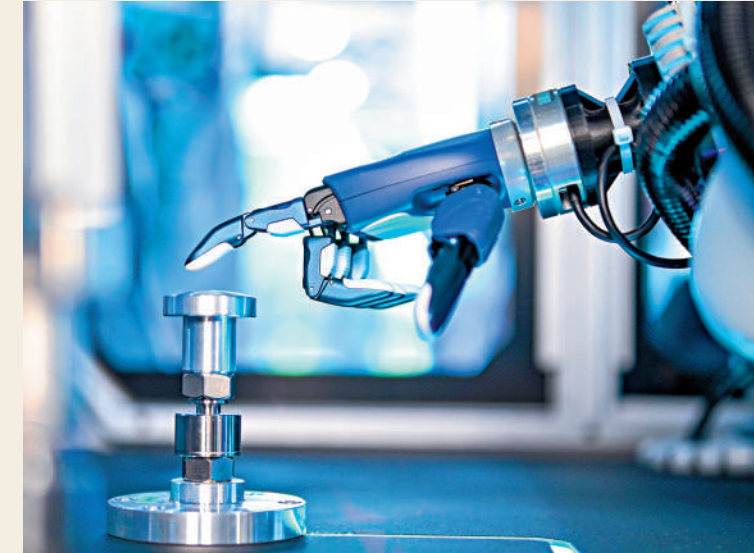
而書中的十二個「工業追問」，將思考引向更深處。自力更生還是開放合作？國之重器優先還是民生所需為重？個人極致奉獻還是千軍萬馬協同？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卻照見了不同時代的抉擇與智慧。在一場「國工閣投票」中，第一代工業人幾乎全選了「自力更生」——因為當年沒得選。而後來者有人選了「兩者都要」，因為開放學到本事，封鎖逼出創新。

讀《百工重器》，我不斷想起那些深藏不露的匠人，特別是當年的鐘錶匠。在澳門老街上，仍有敲打金銀的手工匠人；在三大巴旁的巷弄裏，仍有堅守傳統的手藝傳人。這座融合中西的小城，同樣是中華文明韌性與工匠精神的見證者。澳門雖小，卻從未在歷史的巨變中與祖國分離。四百餘年的中西交匯，非但沒有消解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反而使其在碰撞中淬煉出更強的包容力與生命力。這

與《百工重器》所傳遞的精神何其相似——中華文明的韌性，不僅在於堅守，更在於吸收、消化、創新，最終超越。

小說結尾，所有巨匠都走了，展台上只剩下一把扳手、一項安全帽、一張船票、一片月壤。旁邊寫着一行小字：「我們走了，你們繼續。」而國工閣之外，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工程師剛加完班，騎着電動車回家。他不知道他設計的零件會用在哪兒，但他知道——明天還要上班，還有活要幹。

這不正是中華民族最質樸也最深刻的精神寫照嗎？一百年來，每一個中國工程師的夜晚都是如此。國工閣不是一座建築，是一種信念——是每一個徹夜亮着的燈，是每一個還在



七月二十一日，在無錫市凱奇具身智能機器人訓練場，機器人「靈巧手」在進行演示。新華社

此日高樓集群賢——吳興祚與清初無錫的以文興城（下）



自由談
浦巍

如果說，參與地方文士的雅集或曲宴，吳興祚是以賓客的身份、應和園主的邀約；那麼，他主持操辦的雅集，更顯出其推動文化繁榮的良苦用心。吳知縣舉辦的雅集地點選在了兩處，其一是惠山雲起樓，其二則是其城中官署的聽梧軒和尺木堂。雲起樓的雅集，參與者不乏吳梅村、林古度、余懷等大家的身影；而在聽梧軒、尺木堂中，吳興祚更注重招引陳維崧、顧貞觀等詞章名家。清初陽羨詞派的領軍人物——陳維崧，於清初曾短暫駐錫，其間兩次雅集均在吳興祚官署內舉行。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冬、在聽梧軒舉辦填詞社集會，陳維崧作《眼兒嬌·冬夜聽梧軒舉填詞第二集》，在註解中，明確提及同會諸公為顧貞觀、余懷、吳綺、父丹生、馬紳等人，均為江南詩詞名家；到陳維崧離錫返回陽羨前，吳知縣又於聽梧軒為其組織餞行之宴，陳氏又作了《沁園春·聽梧軒夜集仍疊前韻》，發出「梧軒好，待來春重到，劈紙添香」的感嘆。而對於尺木堂雅集，武進人陳玉璫則曾作《尺木堂公宴詩序》，提及「酒半，各分韻賦詩，成若干首，匯書卷中，而命予為序」之語；其後，陳玉璫還應吳知縣之請，寫下了《夜飲尺木堂》十二首，以唱和吳氏於當日此前在亦園雅集中的詩作。

另外，吳興祚還常常組織余懷、杜浚、秦松齡等無錫文士、知名鄉紳到蠡湖弔古，其間，吳知縣作了《泛舟蠡湖弔古同余澹心杜於皇秦留仙薛國符馬云翎家彤本限韻》，其中有「碧草幾灣魚影亂，黃蘆兩岸鳥聲呼。茫茫吳越成虛幻，為問陶朱事有無。」之詞，湖邊懷古，為文人創作提供了靈感。

昆聲錫音傳嶺南：文化品牌推廣是關鍵

吳興祚作為崑曲的愛好者通過行政手段大力推動崑曲發展，在他的努力下，無錫縣衙經常舉辦集會，聘請崑曲戲班演出。

明代末年，無錫侯氏作為地方望族，在映山河附近營造府邸。順治年間，進士出身的侯某官至刑部郎中，返鄉後，聘請當時造園名家張南垣的侄子張鉉作設計，仿秦氏寄暢園修建了「亦園」。吳興祚與侯某都對崑曲頗為鍾意，兩人趣味相投，侯氏

除了在亦園內蓄養家養崑崙外，還邀請詞曲家萬樹常住園中，故此，吳興祚也成為園中常客，還專門撰寫了《亦園遊塵處小記》，在《侯比部仙蓓新創亦園索詠》一詩中，吳氏描述當時亦園雅集盛景為「此地何如金谷中，連宵花月幾人同」「漫道亦園多勝事，主人忘客客忘歸」。

除了城內的亦園，惠山寄暢園的雅集自然也少不了吳知縣的身影。康熙初年，無錫秦氏族長、寄暢園主人秦德藻邀請金陵曲師蘇崑生、蘇州名伶徐君兒入住園中、教授家班。作為崑曲愛好者的吳興祚同樣常常出入寄暢園中、聆聽曲聲。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九月，吳興祚與余懷、劉體仁、秦鉞等戲曲同好在寄暢園內聽戲賞曲，吳知縣提筆寫下「春風聞度曲，夜月教吹簫」之句，余懷則在其後寫下了《寄暢園聞歌記》和《寄暢園宴集放歌》等詩文，對園內唱和之狀留下紀錄。

而隨着吳興祚轉任福建、兩廣，崑聲錫音南傳嶺南之地，崑曲的藝術性得到極大發揚。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秦松齡被舉薦赴任湖廣軍中，不久之後，吳興祚亦升任福建按察使，而作為江南文壇的巨擘、明代文士的遺老——吳梅村已於康熙十年在太倉去世。隨着兩位梁溪文壇靈魂人物的離世，無錫的文化活動似乎也逐漸沉寂了下來。無獨有偶的是，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黃宗羲苦心撰寫的《明儒學案》成書，對有明一代的文學進行了系統總結，可以說，清代文學發展至此，似乎開始出現了某種新的轉向，一眾誕生於明末的文人群體對有明一代文學傳統慣性下的創作有了新的思考。

吳興祚主政無錫的這些年，一方面創造條件、支持江南文士群體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注重發揚和傳承，尤其是，通過他的努力，崑曲得以走出昆山、走出江南，進而成為風靡全國的戲曲形式。通過興建文化建築、集群眾賢名家，吳興祚與無錫文人群體共同打造了清初江南、乃至全國亮麗的文化盛景。

在平定台灣、經略粵府多年後，吳興祚自兩廣總督任上解任還京，與好友秦松齡相遇於瓜洲。此時距離吳興祚離任錫邑、秦松齡遠赴荆襄，已相隔十年，兩人相聚，兩袖清風的吳都府僅有粗糧、魚乾相待，與當年梁溪群賢集至的勝景已是兩番光景，卻正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仍屬家族遺產，聽起來是否覺得難以置信？走進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希克斯之家」（House of Six，也稱為「希克斯收藏」Collection Six），才懂那份不可思議是真實可見的。

「希克斯之家」的初代主人是十七世紀作家、收藏家、曾任阿姆斯特丹市長的倫勃朗摯友揚·希克斯（Jan Six）。鑒於其私人宅邸的性質，「希克斯之家」雖免費參觀，卻只能在網上郵件預約日期，且僅有每天上午開放一個小範圍導覽。私宅內嚴禁拍照，允許參觀的區域也只有兩層。即便如此，一個半小時帶講解的導覽也令我受益匪淺。畢竟這裏與所有我參觀過的如倫勃朗、魯本斯、洛克斯與斯奈德斯之家等尼德蘭地區故居博物館有着本質區別——作為博物館功能的故居都在試圖還原大師們的生活場景，其陳設很多並非原主人舊藏；而「希克斯之家」則仍有後代居住。房間牆上掛着的弗朗斯·哈爾斯、阿爾伯特·庫伊普等「荷蘭黃金時代」大師真跡均沒有展簽，客廳餐台上整齊地擺着整套「樺欖杯」，代爾夫特藍瓷、明青花瓷等具有時代特徵的藏品在屋內隨處可見……那感覺，彷彿進進了多啦A夢的時空之門，當真穿越到十七世紀揚·希克斯的居所串門一般。



如是我見
張君燕

不遠處有條河，水面開闊，岸邊鋪着平整的青石板，幾棵柳樹垂着長長的枝條，輕輕拂在水面。河邊有一處茶攤，支着那種戶外露營的簡易桌椅，水壺在爐子上咕嘟冒着熱氣。反正也是消磨時光，我索性走過去，點了一杯清茶。攤主把一撮乾茶丟進透明的玻璃杯，沸水沖入，茶葉瞬間在水中舒展，

在二層正門右手側的客廳內，「鎮宅之寶」《揚·希克斯肖像》就懸掛在窗邊。平心而論，直面倫勃朗親筆所看到的畫作質感遠非圖錄可比。大師在《夜巡》後摒棄了纖毫畢現的筆觸，從追求形似轉型為刻畫神似。講解員說倫勃朗曾問希克斯，肖像希望以哪種造型示人，後者則讓大師「自行其是」，這幅氣度非凡卻又略帶私密的半身像便就此誕生。倫勃朗晚年大量使用的厚塗法（Impasto）在此作中極易辨別，甚至在希克斯披在肩上的紅色外套排扣部分清晰可見倫勃朗的拇指指紋——為摯友肆意揮灑的他顯然為了效果已不拘小節，直接用拇指抹擦出排扣的裝飾。順着畫中「戶主」希克斯深邃的目光向房間另一角望去，低矮的玻璃展櫃內並排擺放着倫勃朗更早為他雕刻的蝕刻版畫《窗邊的揚·希克斯》及其初始銅版。彌足珍貴的是，倫勃朗在版畫完成後更將母



▲倫勃朗畫作《揚·希克斯肖像》。作者供圖

幹活的人，是每一件帶着體溫造出來的東西。

從祖沖之的算盤到潘建偉的量子計算機，從萬戶的火箭到嫦娥五號帶回月壤，從解放牌卡車到馳騁全球的高鐵，從超級計算機到華為的芯片，一代又一代中國工匠用雙手證明：中華文明不僅曾在歷史長河中領航，更能在現代工業文明的競技場上立於巔峰。那些沉默的百工，是民族的脊梁，是文明的托舉者。

國工閣不空，因為有人；只要還有人夜以繼日地幹，中華文明的薪火便永不熄滅。那扇門始終開着，等着下一個走夜路的人。

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所繫。

十一代人堅守的倫勃朗摯友遺產

版一併贈予了希克斯。兩幅出自「倫爺」親筆的肖像畫，二人的深厚情誼已無需多言。

能將先人的藝術遺產完整傳承十一代之久，歷代後人的堅持和艱辛可想而知。據導覽小妹妹講解，得知希克斯家族是一九一五年因市區規劃街道拓寬改造而從拐角比鄰的Herengracht街搬到了這棟位於Amstel運河主河道、共有五十八個房間和花園庭院的「略小」宅邸。倫勃朗曾造訪過的家族原址現已拆除。不過，這棟「新宅」同樣建於十七世紀，希克斯家族在搬遷之前做了大量內部結構改造，只為適應並還原家族的藝術收藏陳列。所以儘管我們參觀的並不是倫勃朗老友「原址原味」的故居，卻仍踏入了一段自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便已開啟的家族興衰史。

遺憾的是，高昂的遺產稅讓希克斯家族也需在藏品中作出取捨。一九〇八年，家族以共計七十五萬荷蘭盾（當時一荷蘭盾約等於零點六一克黃金）的價格將三十九幅油畫打包賣給了荷蘭國立博物館，其中八幅被定義為傳世傑作，單維米爾《倒牛奶的女僕》便估值高達四十萬。經本次大規模收購，荷蘭政府允許希克斯家族免徵未來的遺產稅，以確保剩餘的「希克斯收藏」能夠完整保存並永久留在荷蘭。一九二一年，家族再次私下出售了另一幅維米爾名作《小街》，後被買家捐贈給了國立博物館。試想下，若這些受財政原因被迫出售的畫作未被拆散，「希克斯收藏」的價值顯然遠勝今日。即便如此，後人歷經十一代仍試圖完整保存先人收藏的堅持仍令人肅然起敬。

一盞晚茶落日

清淺的草木香氣悠悠漫開。

我選了一個臨河的位置，身前無遮無擋，整片河面與西天盡收眼底。彼時白日燥熱稍稍褪去，雲層被落日染透，層層疊疊鋪在水面上方。起初只是淡淡的橘黃，慢慢往緋紅、蜜紅過渡，霞光落在河面，碎成一片晃動的金鱗，水波輕晃，光影也跟着來回流轉。偶爾有遊客划着小船緩緩經過，船身切開霞光，留下一道細長的波紋，許久才慢慢合攏。

我抿了一口茶，入口微澀，嚥下去後留着淡淡的回甘。我喝着茶，目光隨意落在周遭。有不少行人沿着河邊小路散步，低聲閒談。也有行人匆匆趕路，腳步不停，卻也不忘抬頭看一眼晚霞。

對岸的路燈順着天光一點點亮起，昏黃光點連成一條細線。

茶水涼了，我又續上一點滾水，茶葉反覆沖泡，滋味淡了，心境反倒愈發鬆弛。平日裏總被各樣事務填滿，很少有大片的空間時間，此刻這般毫無目的、純粹放空の間隙，竟顯得格外珍貴。

天色一寸寸暗下去，霞光由濃轉淡，緋紅褪成灰紫，河面的金光漸漸消散，暮色一點點籠罩河岸。杯底的茶水恰好飲盡，茶盞空了，漫天落日也徹底隱沒在遠處的堤岸之後。

手機傳來消息，對方事情處理完畢，可以過去碰面。我放下杯子，起身離開。獨屬於我的一盞晚茶落日，到此落幕。